

# 《望海潮》与完颜亮侵宋的文化建构探微

许龙波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南宋以降,金主完颜亮因听闻柳永词《望海潮》而发动南侵的故事就广为流传,在民间社会深具影响,但流传虽广却并不代表着事实。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完颜亮因词侵宋的故事是南宋中后期历史背景在文化上的投射,这个故事体现了作者罗大经的士人心态以及文化传播的魅力。

**关键词:**望海潮;完颜亮;罗大经;文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 K245/K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596(2015)06-0016-03

**DOI:** 10.13398/j.cnki.issn1673-2596.2015.06.005

完颜亮字元功,女真名为迪古乃,是金太祖长子完颜宗干的次子,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生于今黑龙江阿城县阿什河畔,母亲是唐代渤海国王室后裔。1149年12月,完颜亮通过政变夺取了其堂兄金熙宗的皇位。即位之后,经过多年准备于1161年9月亲自领兵发动南下攻宋的战争。关于金主攻宋一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完颜亮倾心汉学,仰慕中原文化,在听闻北宋词人柳永的《望海潮》后,遂起南侵之心,于是多方筹备,最终发动对宋战争。本文将对这个传说源起的背景及其核心人物进行分析,来探讨这个故事的建构成分。

## 一、传说源起的背景

最早记载“因词引兵”的文本是南宋人罗大经所著的《鹤林玉露》,据其载:

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云:“东南兴盛,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sup>[1]</sup>。

这种说法被后世的诸多笔记小说所引用,并广为传播,在士大夫阶层以及民间都深具影响。完颜亮是否真的是仅仅因为仰慕南朝衣冠,为满足一己之欲,而倾兵南下呢?这个命题很难成立,关于金主完颜亮南侵的原因,学术界现在已有不少研究成果<sup>[2]</sup>,有当时金国内外交困的现实因素,也有完颜亮自身的主观因素,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国家的决策人物,在作出重大决定时,必然要考虑多方的权力格局。完颜亮能久居帝位,证明其绝非庸才,朱东润先生早就指出:“说金主亮受一词的影响而发动南侵,原不足信。”<sup>[3]</sup>

罗大经生于1192,卒于1252,《鹤林玉露》一书“成于罗大经罢官还山之后”,而“大约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丙编完成之后,不久便谢世了”<sup>[4]</sup>。也就是说罗大经晚年一直从事着

《鹤林玉露》一书的写作。一定时期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历史的现实,为此有必要回到历史现场,来看文本中渗透的时代意识。罗大经生活在南宋中后期,那时南宋受到金国政权和新兴蒙古势力的威胁,国家内部已渐渐显现出颓唐的气息。在罗大经生命的前半段,金国受到蒙古的威胁。蒙古族人众多,人人都是战斗的悍将,他们经常攻击金国,对金国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大金国志》记载:“蒙人称帝,既侵金国,得契丹汉儿妇女而妻妾之。”<sup>[5]</sup>这被南宋当权者看做有机可趁,宋宁宗在位时,外戚韩侂胄拜相位,为了树立权威,趁金陷入北部的蒙古战火,国力衰微,无暇南边之机,于开禧二年(1206)发动对金国的战争。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和议。嘉宝元年(1208)宋金达成“嘉定和议”,原来的叔侄关系改为“称金主为伯父,南宋输金‘岁币’增至银绢各三十万两匹,另给金‘犒军银’三百万两”<sup>[6]</sup>。这使得南宋的地位更见卑微,同时给国家财政增加了一笔新的负担。

1210年蒙古开始正式攻打金国,次年就占领金统治区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金国的损失不可估量,1213年“包围金中都燕京,占领金河北、河东路,金人被逼迁都开封(1214),燕京亦随失陷(1215),此后金人续失山东、关中地,退居河南”<sup>[7]</sup>。金人面对蒙古的进攻无力抵抗,但为转移社会危机,稳固统治,1217年“金人遂有南窥江汉之谋……十二月,凤翔副都统完颜赞以步骑万人入侵四川”<sup>[8]</sup>。金国希望通过征宋将被蒙古夺取的金帛、子女、土地从南宋中获得补偿,再者,南宋富庶,攻占南宋,以南宋为战略大后方,也便于以后对蒙古用兵。这样直到金灭,南宋一直陷入与金的战火之中。1234年金国在南宋和蒙古的夹击下灭亡,而与宋结盟的蒙古败盟,“蔡州陷后宋军依约进复三京……决黄河水淹宋军,宋军败还,于是揭开了蒙古侵宋的四十余年的长期战争的序幕”<sup>[9]</sup>。南宋在对金战役结束后并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而又暴露于蒙古铁蹄之下。从灭金后“至宝祐五年(1257)约二十三年,为蒙古攻南宋的准备时期”<sup>[10]</sup>,这一时期蒙古对宋虽有侵扰甚至还三度入侵四川,但主要是掳掠,蒙古和宋并没有发生全面的战争,但是南宋周边的形势已

经恶化,蒙古在北部边境厉兵秣马,同时在南方临境,蒙古军队大肆征伐吐蕃、大理、交趾,南宋已经处于蒙古的军事包围之中。

南宋朝廷到了中后期,国家积弊丛生。先是韩侂胄擅权“内蓄群奸,至指正人为邪,正学为伪,外挑邻敌,流毒淮甸”<sup>[11]</sup>。“嘉定和议”后奸臣史弥远当道,“幸帝耄荒,窃弄威福”<sup>[12]</sup>。时人魏了翁就指出:“权臣相继,内擅国柄,外变风俗,纲常沦败,法度堕弛,贪浊在位,举事弊蠹,不可涤濯。”<sup>[13]</sup>理宗亲政后“不闻减退官女,而嫔嫱以溢于昔时;不闻褻禄功臣,而节钺先加于外戚;不闻出内帑以犒战士,而金帛多靡于浮费”<sup>[14]</sup>。

这样一种客观形势对生活在南宋中后期的士人影响是巨大的。北部的政权一直是南宋一个巨大威胁,是压在南宋士人心中的一块石头,面对这样的境遇,南宋朝廷无力革新。罗大经生命晚期的南宋已与北宋末年相似,宋人笔记称:“至(理宗)宝佑、景定,则几于(徽宗)政(和)、宣(和)矣。”<sup>[15]</sup>时局如此,国家危矣,罗的作品中自然会渗透出他对于国家的忧患意识。罗一介书生,为官低微,无法施展自己的满腔抱负,于是权将心事付于笔墨之中,让文字承载他对国家、民族深深的忧虑。

## 二、罗大经的文人情怀和文学思想

完颜亮侵宋是绍兴31年(1161),通过罗大经的生卒年份可知,罗大经并未亲身经历过南宋初年完颜亮南下的战乱。罗大经在仕途上并不得志,在1226年登进士第后,曾做过几任末流小官,晚年在抚州做官时,还因为当时朝廷中一场政治纠纷的牵连被罢官。但是从罗大经文字中流淌的气质中可以看出其南山悠然之情。在《鹤林玉露》丙编卷四中他这样写道: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鸣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sup>[16]</sup>

这样的一种恬然、宁静致远的心境同其未能施展满腔抱负的现实的反差如此之大,我们不难看出作者颇具陶渊明的那种风姿。正是这样的一种诗意情怀,在面对充满棱角的环境时,为求得内心的适然,一种文人特质的情愫就宣泄而出。这种情愫将外界的纷繁复杂挡在理想的状态之外。由此,罗大经构建出“因词引兵”的故事,同罗自身的文人情节有很大的关联。罗自持于中华是礼仪之邦,文物典籍卷帙浩繁,文化昌盛的这样一种文化情节,面对“蛮夷”的入侵,他清高的认为,正是中华文化的吸引力让“蛮夷”引兵来犯。

在《大悲阁记》中,罗大经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金人自惭的故事。孝宗皇帝喜欢击球和骑马,有一次不小心伤了一只眼睛。“金人遣贺生辰使来,以千手眼白玉观音为寿,盖寓相谑之意。上命迎入径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门,住持僧说偈云‘一手动时千手动,一眼观时千眼观。幸自太平无一事,何须做得许多般。’使者闻之惭。”<sup>[17]</sup>作为一国使者怎么会如此轻易就“惭”,这带有很强的主观成分。对于金国使者是否感到“惭”我们无从考证,但是在罗的笔下他们肯定是“惭”的,罗紧接着评论道:“太史公所谓谈言微中,亦足以解纷,信矣。”<sup>[18]</sup>

由此可见,罗对汉家文化充满了自信,小小一偈,即让金使“惭”。

罗大经的文学思想对于这个传说的形成也有很大的作用。有学者在研究罗大经关于李白杜甫的评价时就指出:“凡是心系苍生社稷,胸怀王室海宇,上以忧国,下以忧民的诗人作者,就属高属优;凡与之相反或与时代艰难、民生疾苦联系不紧的作者诗人,皆属下属劣。”<sup>[19]</sup>可见在罗大经“主张文学要紧密切联系现实社会与政治,主张文学要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思想性,要内容充实”<sup>[20]</sup>。

南宋诗人谢处厚听闻《观海潮》写了一首诗:“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sup>[21]</sup>罗大经对谢词的评价为:“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塘桂香,装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大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同时自己还作了一首诗与其相和,诗云:“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宫殿无人春昼长。”<sup>[22]</sup>我们通过罗的评论可以看出罗的拳拳爱国之心,同时罗的文人思想与政治立场也可见一斑。罗大经让美如画面的江南同窥视的金人结合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冲击。宋国君臣安于南朝的笙歌酒暖,春红夏艳,临安的暖风软化了君臣的斗志,特别是理宗皇帝“忧勤于路朝之思,而入为晏安所移”<sup>[23]</sup>。他是一个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传统文人,但对于国家日益衰败,别说恢复故土就连保全半壁江山也成为奢谈的这样一种现实深深的不满,“是则深为可恨”!

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罗认为“樵夫谈王,童子知国”不为僭越,“春秋许之”<sup>[24]</sup>,可见他希望普通人也关心国家安危。在评述“利害”时,罗针砭时弊,畅谈“朝廷益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有一计较利害之心,便非儒学”<sup>[25]</sup>。透过这些我们不难窥见罗大经身上“文以载道”的儒家思想。罗大经选择柳永和完颜亮可谓恰到好处,这两位都是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罗将不同时代敌对双方的人巧妙的通过一首词联系起来,让完颜亮和柳永两个人打出“组合拳”,藉此实现了这个故事的广泛传播。

柳永才华横溢,词文风靡一时,南宋人叶梦得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sup>[26]</sup>可见柳永词在南宋广为传唱。当时许多士大夫禁止小孩读柳永的词,认为其很“鄙俗”,但正是因为其“鄙俗”才赢得了民间社会的欢迎,百姓所认可的文化不需要高深,而是直接、通俗、易懂。文化只有深入到民间才具有生命力,这也是柳永词至今仍然具有魅力的根源。柳永在基层社会拥有广大的读者,关于他的传闻,往往会不胫而走。

另一位主角完颜亮“幼时名孛烈,汉言其貌类汉儿。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气”<sup>[27]</sup>,还“渐染中国之风”<sup>[28]</sup>歆慕汉文化,这是传闻为人所接受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柳永词本身写得山水浮动、意境邈远、极富感染力,对人有一种深深的吸引这是文学的基础。但需要寻找或者说构造一个合适的受众,在宋金对峙的“第二个南北朝”

喜欢中原文化的金主完颜亮无疑就是最佳的选择。《四库全书》记载完颜亮的作品有这样一首诗：“万里车书尽会同，江南岂有别封疆。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sup>[29]</sup>这首诗题为《南征至维扬望江左》，按题可知是完颜亮在南侵过程中，进军到今镇江、扬州一代望着不远的江南有感而发临时挥毫而成。但是通过考证发现事实与题名可能有误，这首诗并非是写于南侵之时。《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修建汴京的这年冬末完颜亮“遣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生人观本朝隐画工于中间使节，写临安之城邑市井及吴山西湖之秀丽立具图”。施宜生将图带回金国献与完颜亮，完颜亮命能工巧匠将这幅画进行了改动“写之城邑闻兵火残毁于吴山绝顶，写己策马而立焉”<sup>[30]</sup>。这幅画画出了临安城正处于兵火之中而完颜亮“奋髯箕踞，不胜其志之锐”<sup>[31]</sup>策马俯瞰南朝江山的一种恢弘大气征服之势。他还命翰林修纂蔡珪题写了一首如前的七言绝句。这首诗深为完颜亮喜爱，读后“诡曰御制”<sup>[32]</sup>，此后广为流传。由此我们可知《南征至维扬望江左》实是蔡珪所为，完颜亮只不过是拿别人的成果为自己添彩，但是可以看出完颜亮倾慕于南朝风雅，在主观上乐意把自己打扮成文人形象。若完颜亮只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赳赳武夫，不懂汉人文化之美，对汉人的文化持排斥态度的话，说他“因词引兵”的言论在当时就难以立足，更别说流传于后世。

正是因为柳永和完颜亮在宋金两国都深具影响，再加上他们的特殊身份，因此他们的“强强联合”为这一绝妙故事的传播，提供了不息的动力。

文化的魅力不一定在于真实，而在于文字中以词达意、抒发怀抱的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在罗大经的成长历程中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文人以天下为己任，深怀家国天下的意识。在国家承平、内无叛乱、外无边衅的年代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外在表现还不明显。可是一旦国家出现危机这种意识对文人的影响就发生蜕变，对外表现显得尤为剧烈。文学作品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反映，《望海潮》与完颜亮南侵的故事既反映了时代的背景又呈现了当时的文人心态。这是一则文人构建的假的“真”故事，假在故事本身是假，真在当时社会的确有这样一种危机。透过这样一种似假还真

的建构，我们可以了解大时代背景下的士人心态，这也是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源泉。

参考文献：

- [1][4][16][17][18][21][22][24][25] 罗大经. 鹤林玉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41, 361, 304, 240-241, 241, 242, 242, 117, 50
- [2] 刘肃勇. 论完颜亮南征伐宋的战争. 求是学刊, 1987, (5): 83-88; 王宝织. 海陵王南侵的心理分析. 蒲峪学刊, 1997, (4): 48-49; 陈鸣钟. 略论金主亮南侵. 史学月刊, 1956, (12): 15-18.
- [3] 朱东润.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宋金部分[G].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7.
- [5] 宇文懋昭. 大金国志: 卷 22: 东海郡侯上[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0. 161.
- [6][7][9][10] 尚钺. 中国历史纲要[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292, 312-313, 313, 313.
- [8] 宇文懋昭. 大金国志: 卷 25: 宣宗皇帝下[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0. 185.
- [11][12] 宋史: 卷 40: 宁宗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781.
- [13] 宋史: 卷 437: 魏了翁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2963.
- [14][23] 宋史: 卷 405: 李宗勉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2236.
- [15] 周密. 武林旧事: 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9][20] 梁勇. 从李杜优劣论看罗大经的文学思想[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1985, (3): 48-53.
- [26] 叶梦得. 避暑录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49.
- [27] 宇文懋昭. 大金国志: 卷 13: 海陵炆王上[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0. 104.
- [28][30][31][32]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 卷 242[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740-1741.
- [29]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445 册[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8. 25.

(责任编辑 姜黎梅)

## 本 刊 声 明

发表于本刊 2014 年 12 期的《近 80 年来契丹大字研究综述》一文，作者张少珊，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生；工作单位：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特此说明。

赤峰学院学报编辑部

2015 年 5 月 30 日